

里；试观于海才见龙门冠岭云水千重。”此联为钦差大臣工部尚书杜臻所书，笔力沉雄、苍劲古朴。两旁耳门上方均有石刻“激月”、“激云”四字。

门楼内壁上，镶嵌有三方石刻，是清乾隆年间廉州知府康基田所书《海角亭远眺》七律，碑字体为行书、笔势如箭、一气呵成。特别吸引人的是门楼左侧的一方“鹅”字碑，碑高约90厘米，宽约50厘米，整块碑只有一个“鹅”字，是一笔书成，潇洒飘逸，为清代陶洽所书。

第二进为海角亭的主体建筑，垂檐、歇山顶、殊红墙壁、琉璃碧瓦，檐牙高啄、螭吻镇角、直凌霄汉。屋脊上双龙戏珠，惟妙惟肖，形态逼真。亭为正方形，高台基，四面为回廊，前后石级上迭。亭内前后敞开，左右为两大园窗相对，造型古朴雅致。亭的上下檐之间，全是回字形图案的雕花窗棂。檐下的封檐板，雕着各种动植物图案及历史故事的高浮雕，刀法精细，形象生动。

海角亭的正面两条水柱上镌清道光年间陈司燿题写的对联：“海角虽偏山辉川媚；亭名可久汉孟宋苏。”汉孟，是汉代的孟尝。宋苏，是宋代的苏东坡。

海角亭内古碑镶满四壁，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亭的前面两侧各有一碑，高约2米，宽约80厘米，两碑碑面和碑背各有题刻。左侧一碑正面为《重修海角亭记》，该碑记述了修建海角亭的情况，碑背为古越吴共昶的诗刻《题海角亭记》，字体为行草，姿态横生，极尽飘逸隽秀之致。亭的左侧一碑为《海角亭记》是元人陶正中所撰，记载历代修建海角亭的经过，其碑背为《复建海角亭记》，碑心书体为欧体书法，刚利道劲，英气扑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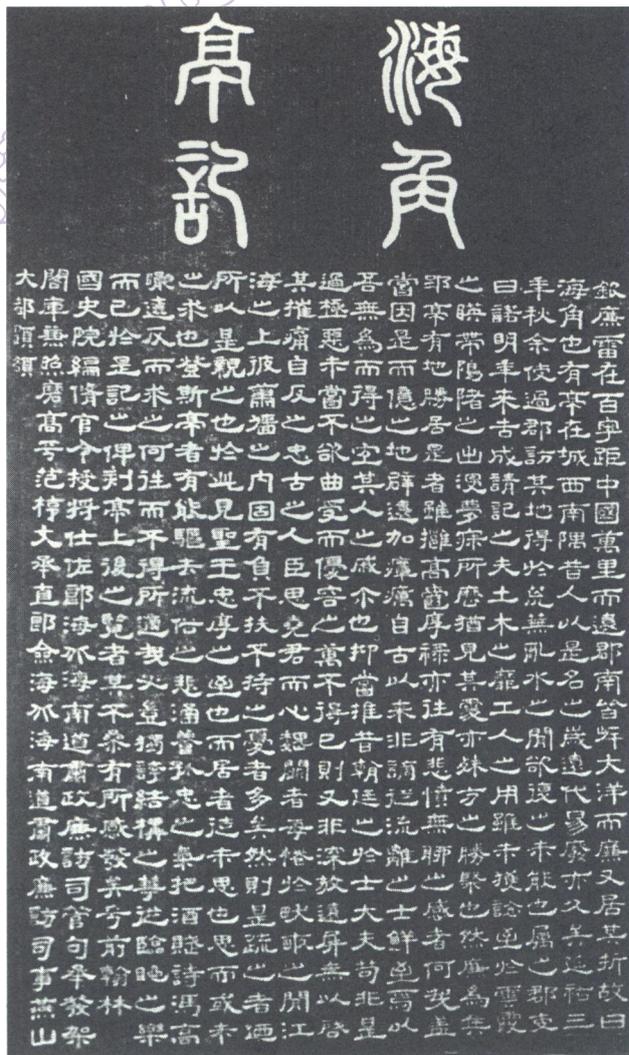


图 6-17
海角亭碑刻。

亭内右镶嵌两方碑刻，书法脱胎于赵孟頫，书体端庄淳朴，另一方碑是《廉州府复建海角亭记》，为明人所作，碑文书法为魏碑体，写得容雍而秀丽，神韵飘逸，有如飞掠晴空的行行白鹭，保持魏的风骨，是十分难得的书法精品。亭内尚有一方碑刻为清雍正年间，廉州知府张绍美写的七律《登海角亭》，诗人描写了当时海角亭四周的风光，书体脱胎于褚遂良，隽逸秀媚。亭的两面空地正中处，有一方古碑高约 1.3 米，宽约 70 厘米，上刻“古海角亭”四个大字，书体气势峥嵘，跌宕奇肆，为清人所书。

自有此亭，登临者情怀各异，触景处梦回沧桑兴废之间。忠贞孤臣，寄情托意，飘零文士，追昔抚今。“临流赋诗，对月把酒”之时，几多壮怀激烈黯然随波而逝，几多旅愁伤感尽入青灯梦境。古人之看重海角亭，是因为“寓斯土而登斯亭者，有能驱去流俗之态，涵养孤忠之气”，“能剔垢磨光，扬清激浊，宁悉正以报国，毋顾身以忘民”（元·伯颜《海角亭记》）。

合浦海角亭见证千年古郡的世事沧桑，也目睹了合浦海上丝绸之路的功能转化。

公元589年，隋文帝挥师灭陈，结束了自魏晋南北朝以来369年（220—589年）的分裂割据局面，一个统一强大的帝国重新崛起。盛世之治，海上丝绸之路的对外贸易又得到了恢复发展。特别是进入了盛唐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不但商贸活动空前繁荣，航线也不断地伸延，沿线港口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料显示，唐代的海上丝路航线全长超过了14000公里，沿线港口分布日增。合浦港（乾体港）的始发地位也产生转移，其中心港口地位也被广州港代替，形成了广州港为中心，以潮州义安港为粤西门户的海上丝路航运新格局。

首先是商品贸易方面。唐贞观六年，已在合浦设有珠池县（今北海市境），此后一再下令“廉州珠池，与人共利”，“一往商人兴贩，不得禁止庄来”（见《旧唐书》）。贞观八年（634年）改合浦设廉州（见《新唐书》），这是廉州珠市最开放时期，有唐诗这样描写廉州珠市：“领得卖珠钱，归还铜柱边。看儿调小象，打鼓试新船。”合浦海上丝绸之路的商品贸易虽然仍把珍珠作为传统商品，但已不是骨干产品。此时朝廷对合浦的特产进贡重点不是珍珠，而是盐、金矿、银矿，而且廉州是唐王朝指定贡银州府之一，

必须按时完成朝廷下达的“指令性任务”。合浦海上丝绸之路的运输功能当然要服从运送朝廷贡品（金、银）及盐的需要。特别是盐产品专卖的运输，宋周去非在《岭南代答》中描写述甚详：“盐场滨海，以舟运于廉州石康仓。客贩西盐者，自廉州陆运至郁林州，而可以舟运……官以牛车自廉州石康仓运盐贮之，庶一水可散于诸州。”“凡请盐之州”即“通前十六州请盐于十万仓者”，都是通过合浦海上丝绸之路转内陆漕运网络。斯时盐产品漕运成为主要的商品。廉州作为朝廷指定的岭南贡金十三州，贡银三十州之一，矿石的漕运量也是很大的。而丝织品、茶叶、陶瓷及其传统商品则转道广州港，由朝廷设在那里的提举市舶司统一经营管理（市舶司相当于后世的海关职能，唐始创）。合浦海上丝绸之路的功能适应此时需求则以内陆漕运为主。

再次是军事上的需要。唐王朝进入了中后期，各地战事不断，特别是岭南、西南一带的少数民族的反抗，更是此起彼伏，其中最著名的是咸通年间僚人联合南诏军队两陷安南都护府之战。

咸通三年（862年）十一月，由僚人组成的“白衣没命军”与南诏军队联合，共调集5万多军队一举作气攻下了安南，唐朝廷的三万守兵全军覆没。第二年，南诏军攻陷交趾，唐军几乎全部被歼；接着，僚人军与南诏军乘胜追击，直逼邕州。史书称这是“二陷安南，两打邕州”，“岭南皆摇动”。为了挽救败局，唐朝廷任高骈为安南都护本管经招讨使，驻军廉州（时称“海门”）。高骈充分运用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优势，从海路分兵出击：一是从合浦乾体港出兵直攻安南。二是从合浦大风江江港出兵经钦州龙门港转攻邕州，结果是大获全胜，收复安南，解围邕州。经此役之后，

唐王朝认识到了合浦军事地位的重要性，战时一度撤销了安南都护府，将安南都护府行营设在廉州。

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在收复安南，解围邕州的战役中，高骈海门治军时，借助合浦大风江港海路通道，开凿了钦州转入防城港人工运河“天威遥”，缩短了航行路程，不但使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多了一条进入安南的海路，也使这条海路伸延至邕州境，对后世的边防、海防、漕运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据史籍记载，宋朝南征灭汉，明朝海防抗倭寇，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在其中都起了重要的军事作用。特别是南明政权军队在与清朝军队十四年对抗中，基本上都是在唐朝开辟的这一以合浦海上丝绸之路为中心的海路通道网络为军事基地，反复开展拉锯式的争夺战，大小战役数十次，朝廷也因此海上对外贸易始发港乾体港建立了军港乾体营，拥有二十三艘各式铁壳战舰巡防海域，防区伸延东至广东虎门西至越南白龙尾海面。

唐朝时，经济繁荣，国势强大，中国和日本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空前繁荣。为了学习唐朝的政治制度和博大精深的文化，自唐太宗贞观年间至唐朝末期，日本派到中国的遣唐使并成行的就有13次之多（有一次仅达百济），还有一次是派到唐朝的“迎入唐使”（赴唐的日使，久未归国，派使团前往迎接），两次是“送唐客使”（送回唐朝的专使）。使团中有许多留学生，还有留学僧，其中不乏好学之士和学识渊博之人。

日本遣唐使团航海到中国来，有以下阶段：

唐朝初期（唐太宗贞观四年—高宗总章二年，即630—669年）日本派出的使团，一般规模较小，船只一二艘，约200人。

航线：走北路。自九州博多湾—对马岛—沿朝鲜半岛沿岸—辽东半岛

—山东半岛的登州、莱州。这条航线需时数十天。



图 6-18

合浦三叉港口群地图大风江港口，是唐高骈“海门屯兵”的出兵路线之一。

唐朝极盛期（武则天长安二年—玄宗天宝十一年，即 702—752 年）：日本派出的使团规模扩大很多，人数都在 500 人以上，分乘四艘船只来大唐。

航线：这时期因新罗与日本的关系恶化，只好开辟了一条新的航线即南岛航线：自九州—日本南岛诸岛：种子岛（多弥）、屋久岛、奄美大岛—横渡东海—明州、扬州。航线风险大，航程也不短。

唐朝后期（肃宗乾元二年—懿宗咸通十五年，即 759—874 年）。由于 755 年开始的安史之乱的影响，唐国势日衰，日本遣唐使团规模和人数不如前。

航线：安史之乱后，开辟了一条新航线，即南线。自九州博多湾—长崎以西五岛列岛（等待顺风）—横渡东海—明州、扬州。这条航线航程短，

遇顺风 10 天就可到达，只是当时日本造船技术水平及航海技术所限，风险最大。

中国人不断东渡日本进行中日文化交流，其中贡献最大的是鉴真和尚。

鉴真六次东渡日本，对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直接促成了佛教由中国从海上丝绸之路向日本的传播，因此在日本国内开行了中国式的佛教和佛学体系，特别是鉴真第五次东渡时，被台风刮到海南岛，在海南岛传播了佛教，取道合浦郡境回杭州，这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一件文化交流盛事，特录鉴真六次东渡经过于下。

第一次东渡（743 年 4 月） 鉴真及其弟子准备在大唐天宝二年（743 年）东渡日本。准备工作在顺利地进行着，但鉴真大弟子道航认为随行的如海和尚只是少学晚辈，不适合跟随鉴真东渡。如海和尚大为不满，就秘密向淮南采访厅采访使沈景清诬告道航通海盗，说：“道航造船入海与盗贼连。”沈景清当即扣留了如海并派兵到各寺院搜寻中日僧人，道航、荣睿、普照等都被逮捕，所造的船只也被没收入官，第一次东渡还没出发就失败了。

第二次东渡（743 年 12 月） 8 月，日僧荣睿、普照被释放后，决定再次恭请鉴真一起回日本。他们秘密到大明寺谒见鉴真，面陈邀请之诚意。鉴真深受感动，为了却心愿，他出钱 80 贯从岭南道采访使刘臣邻那里买到一艘旧军船。又雇船工 18 人，工匠 85 人，准备了经书等书籍和粮食、医药等一应物品。十二月中旬，鉴真等从扬州出发，顺长江而下，当航行到狼沟浦（今江苏南通市狼山江面）时，遇到了狂风，江浪汹涌，船只触礁而破，已无法行驶。船工只得把船停靠浅滩暂避风浪，争取时间抢修船只。

谁知又遇涌潮，水深及腰，正当寒冬，冷风刺骨，粮米被浸，腹内无食，无法前进，只得返回岸上。

第三次东渡（744年春） 鉴真矢志不移，一个月后（744年春）再次准备好粮食、淡水等物，修理好船只后，他想从大坂山（今六盘山）直航日本。可是到了大坂山后无法泊岸，只得转大屿山。正遇逆风，只好等待顺风，一个多月后才得乘顺风继续航行。当近乘名山（今舟山岛北的大衢山）时，又遇巨大风暴，好不容易快要靠岸时，又触暗礁，船撞破了，沉入海底，大家备尝艰辛地爬上岸后，虽是死里逃生，干粮、淡水也全没有了，又面临饥渴的威胁，经过三天三夜，才遇到渔民，得到搭救。当地僧侣得知此事后，他们不愿鉴真再冒惊涛骇浪之险，请求地方官逮捕日本僧人荣睿等人，于是，鉴真等就被明州地方官软禁于鄞县（属明州管辖）著名寺院——阿育王寺中，第三次东渡又失败了。

第四次东渡（744年） 各地僧众听说鉴真到了阿育王寺后，便纷纷前往请求鉴真大师去讲学。唐天宝三年（744年）鉴真到越州（今浙江省绍兴市）、杭州、湖州（今江苏省吴兴县）、宣州（今安徽省宣城县）等地巡回讲学传授戒律。讲学过程中秘密筹集再次到日本的费用。为防止官府的追捕，经过缜密的考虑，他计划在福州登舟赴日。为此，他派弟子等先到福州买船，作远航准备。然后自己借到各地名山名刹古寺朝拜佛迹为名，再乘机脱身至福州，与在福州的弟子会合一起赴日。但事机不密，鉴真在扬州的弟子灵祐听说师父将再次东渡后，他不忍师父去冒“沧溟万里，死生莫测”的漂洋过海之风险，就联合了各寺僧众状告官府，以防止鉴真东渡。据此，江东道采访使就派人赶到黄岩县禅林寺把鉴真等送回扬州大明寺。

由福州登舟赴日的计划也失败了。

第五次东渡（748年） 唐天宝七年（748年）春，日僧荣睿、普照从同安郡（今安徽省安庆市）乘船抵扬州崇福寺谒见鉴真，商定再次渡日，并立即准备船只及各种随带物品，六月二十七日，鉴真及弟子、水手等35人自扬州崇福寺出发，至扬州三汊河口登舟，沿运河至瓜洲镇入长江，行至狼山又遇恶浪，终于冲出长江口在杭州湾出海。他们历经艰险等候了一个多月，才等到西南顺风，扬帆东进。船刚驶离舟山群岛进入东海，不幸又遇到东北风，“风急波峻，水黑如墨”，又把他们吹向西南。到第九天，船靠近一个小岛，大家赶快登岸，找到了淡水，把船上储满了水，继续上船前进。在海上漂流14天，靠了岸，只见到处树木茂盛，鲜花盛开，原来风暴把他们从东海吹到了南海，他们已来到海南岛最南端。接着抵达振州（今海南岛崖县——三亚），被地方官派兵把鉴真一行迎住城内大云寺，在这里住了一年。以后，经万安州（今万宁）、崖州（今琼山），过琼州海峡，又在桂州（今广西桂林）、南海郡（今广州）等地停留，途中日僧荣睿因劳累过度不幸病逝于端州（今广东高要），鉴真由于悲痛过度、辛劳、酷暑而眼睛发炎，最后双目失明。始终追随他的忠实大弟子祥彦也因长年积劳成疾不幸逝于江西，这对鉴真来说实在是极为沉重的打击。历经三年的苦难艰辛旅程后，鉴真等最后经九江、南京回到了扬州。第五次东渡失败了，这也是鉴真东渡过程中最惨痛的一次失败。

鉴真第五次东渡的回程路线是雷州—罗州—辩州—象州—白州……桂州，他是沿合浦郡境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内陆航线行走的。

第六次东渡（753年1月—754年2月） 鉴真东渡的意志弥坚，他从海

南岛回到扬州后，不顾双目失明，继续筹集文物准备东渡。

唐天宝十二年（753年）十月十五日，日本第10次遣唐使归国前夕，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副使吉备真备、大伴古麻吕和仕唐多年、历任唐光禄大夫、御史中丞、秘书监等职的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等也准备回国，他们同到扬州延光寺参谒鉴真。藤原大使说：“早闻大和尚曾五次东渡日本欲去传教，今日得见，万分荣幸，若大和尚仍有此愿，弟子等有船四艘返日，应用物品俱备，不知肯同行否？”鉴真虽已66岁高龄，且双目失明，但为了传教授戒，为了中日人民的友好及文化交流，应允了日方恳请。

鉴真带去的物品有如来、观世音等佛像8尊，舍利子、菩提子等佛具7种，华严经等佛经84部300多卷，还有王羲之、王献之真迹行书等字帖三种。

鉴真自743—754年经12个年头，先后六次在沿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上东渡日本，备受艰辛，终于以非凡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实现了自己宏伟夙愿，踏上了日本的土地。

合浦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空前活跃的同时，经贸商品也得到了扩展。

唐代的出口商品仍以丝织品和陶瓷为大宗，此外还有铁、宝剑、马鞍、围巾、斗篷、披风、貂皮、麝香、沉香、肉桂、高良姜等。进口商品除了象牙、犀角、珠玑、香料等占相当比重，还有林林总总的各国特产。

唐代以强盛的国力，大力发展航海和造船业，是中国历史上航海事业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扩展和沿线港口城市兴起强大

的时期。除了中国与日本的航线，唐代还将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扩展到了黑龙江至伯力（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广州至南海西非和东非的航线。

唐代还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国航线沿海港口城市设置了提举市舶司，加强对海外商贸的管理，因此又催生一批港口城市，形成了我国航海重心逐渐南移格局，东南港口日益兴起。主要有：

交州港（比景港） 今属越南，位于顺化灵江口，它是南海航行中的必经之地，从广州航行四天可达。它南通南洋、印度洋，北达广东福建。唐中叶后期，因广州官吏剥削严重，中外海船转移到交州港交易货物，交州港更为繁荣。直到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年），黎桓自立为安南王后，才逐渐脱离中国管辖。

广州港 位于珠江口，濒于南海。随着唐代航海贸易量的增长，广州港由于水陆交通条件，发展为中国第一大港。往返于东西亚之间的中外海船多以广州港为起止点。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在广州设立了市舶司作为专门从事航海贸易的管理机构，并委任了相应的官吏舶使。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因原设的市舶使位卑权轻，不足胜此重任，便以岭南帅（节度使）监领此职。唐代市舶使负责进出口航海贸易，包括征收船税（“舶脚”）；登船检查货物（“阅货”）；代表政府收购珍宝异物（“收市”）；接收船商献给中央或地方政府的礼品（“进奉”）；收取货税（“抽解”），中外船商办完手续允许他们做生意，也要交税入官。唐后期每年入港船约4000艘，阿拉伯、波斯、印度、南洋等各地商人、僧侣云集，侨居广州的商人有12万人以上。

泉州港 位于福建东南海滨，扼晋江入海口朱州湾内。唐代泉州、广

州、明州、扬州并称四大港口。在这里进行贸易文化交流的主要是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东南亚人。他们有的经商，有的进行伊斯兰教传教活动。

福州港 地处福建闽江口。福州开港的历史比泉州更古老。在唐时其地位在泉州之上。唐后期文宗大和年间（827-835年）在此设置了市舶司，管理海税等的征收。

明州港 明州即今之浙江宁波。地处甬江下游，是奉化江、余姚江、甬江交汇处，三江由此汇流入海。是古代东南大港之一，自对日南线开辟后，是唐代中后期东渡日本航路最近的港口。

扬州港 自隋开大运河后，扬州处于长江与运河的交汇处，成为国内南北物资集散地，也是国外商人从事珠宝、丝绸、瓷器贸易的场所。唐代的扬州“富庶甲天下”。不少波斯人、阿拉伯人在此定居，形成“波斯庄”、“波斯邸”，高丽、日本很多留学僧俗人员也多从扬州进出。唐时扬州达到空前的繁荣。

登州港 今山东烟台市蓬莱县，濒临渤海，与辽东半岛隔海相望。是唐代内对东北地区，外对高丽、日本的主要港口，又可南下入大运河，或由沿海入长江口，自古以来是我国丝织品的主要产地，并盛产黄金，经济及航海的地位都极重要，是北方第一大港。

到了宋代，合浦海上丝绸之路的功能又产生了新转化。

宋代是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港口变化最大，海上丝绸之路商贸结构变动强烈的时期。主要标志有二：主要的商贸物流集散港口由广州迁向泉州，港口布局和功能趋于分散；商品贸易方式由“贡献”、配额（即由朝廷指定品种和数量）制转化为在提举市舶司管理下的自由贸易。商品的种类也随

市场需求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即进口商品种类急增，最高峰时达 420 种。出口商品则略有压缩，陶瓷产品成为主打，丝绸及丝织品退居第二。在这种结构调整状态中，一些沿线港口的功能退减，甚至失去作用，而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对外贸易功能却能乘势而上，盛况空前。

此间，陶瓷产品代替丝织品（即“杂缯”）成为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第一大商品，刺激了合浦陶瓷生产的快速发展。合浦作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为了配套蚕丝及丝织品的出口贸易，在汉代就建有多处汉窑群（经考古发现有位于西门江出海口岸边草鞋村的合浦汉窑群、距乾江港三公里处的老哥渡汉窑群山口英罗港附近的汉窑群等）专门生产陶器供出口。到了宋代，朝廷为了适应海上丝绸之路贸易陶瓷出口不断扩大的需要，又在合浦建官窑，专门生产供出口用的陶器。这就是著名的合浦福成下窑。下窑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

从上窑址发掘的瓷器碎片中可知，当时生产的瓷器品种多样而且非常细致精美、特别是大量的黄轴瓷器碎片的出现，说明了产品的专用性。就规模而言，下窑遗址群至今仍保存有五座古窑的遗址，五座古窑之间的间距相隔 30 米左右。由此见证了这是一处大型的宋瓷生产窑群。随着宋瓷的大量生产，相应的专业市场也就应运而生，这就是位于廉州镇古城西门古渡南侧的廉州“缸瓦街”的出现。大量的宋瓷产品从廉州“缸瓦街”集散，沿西门古渡顺流而下，进入“南望交州去路长”的海上丝绸之路，运转到东南亚及中欧各国。

宋瓷生产的大规模发展促进了合浦丝织品生产的发展。斯时，合浦丝织品生产不但规模扩大，品种增多，在工艺质量上更是精益求精，锦上添花。

花。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一书中就记载的有当时合浦丝织品生产的情况：“雷、化、廉州有织匹、幅长阔洁白细密……有绝细而轻软洁白，服之且耐久者。”由于廉州的织匹精美耐用，常有安南使者到廉州，官府宴请该使者时，“人以绢一匹”（相赠），安南使者及其随行获赠者舍不得剪裁制衣，而是“皆拆取色丝，而自以织衫”。可见当时廉州丝织品的生产工艺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并成为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市场中的名牌紧俏货，成为官府“指定”的商务礼品。

宋代合浦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贸发展，还推动了合浦采珠业的产业化进程。合浦古代采珠靠人工“没水而采之”，宋代参知政事，广西经略使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描写的是“榜人以绳系其腰，绳动摇则引而上”，这种没水而入的采珠方式，常常是被鲨鱼鲛鳄所咬，非死即伤，“往往溃腹折肢，人见血一缕漂水面，知蛋（蛋人）死矣”。随着合浦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扩张，对珍珠产业提出了规模化生产的要求，以单人采珠的方式显然已不能满足日益增加的市场需求。于是合浦的采珠生产发生了质与量的变化。在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的记述中，合浦珠民由“没水采珠”改良为竹筐沉底扬帆采珠，这样一来，采珠量大增，技术日趋成熟，因此才有了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年采珠二万八千两的惊人纪录。关于宋时海上丝绸之路的珠市盛况，《岭外代答》是这样记录的：“珠熟之年（丰收），蛋家不善为价，尽为黠民以升酒斗粟，一易数两。既入其手，即分为品等铢两，而卖之城中。又经数手，乃至都下，其价递相倍，至于不赀。”合浦珍珠在海上丝绸之路珠市的交易中，“又经数手”，到了各国的都市或中原城市，不但身价“价递相倍”，而且供不应求。



图 6-19
明代合浦官窑上窑遗址。



图 6-20
宋代合浦官窑下窑遗址。

宋代合浦海上丝绸之路的对外贸易，促进了合浦官瓷、丝织品和采珠产业的发展，同时也提高了合浦的区域地位。宋末元初，朝廷先后在合浦设置了提举市舶司（相当于海关职能）、提举采珠司，使合浦海上丝绸之路

的商贸活动进入了政府管理的规范化轨道。“商夸合浦珠胎贱，民乐占城稻谷丰。”（宋·陶弼《三山亭》）可称几家峻宇相高下，无数征商自去来。合浦海上丝绸之路盛况再现于斯，时称“东南岿然一大都会也”。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另一特征就是以合浦始发港为中心，形成了三条新的次航线通道，这三条航线通道是广州海路通道、钦州海路通道、廉州海路通道。

广州海路通道 广州海路通道的起点是广州。由于此时朝廷在广州等地设置了市舶提举司来管理外国商船，“广州通海夷道”也就成为中国对外久贸易的四条国际航线之一，据《唐国史补》：“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而广州到交趾的航线必须经钦廉门户之称的“海门”，就是今北海市区冠头岭至与今钦州相邻为界的大风江港口一带，也即唐高骈海门屯兵，修通交、广、邕水路通道之所。但由于交广海路路途遥远，海途风险多变，因此“交趾回，乃舍舟，取雷州缘岸而归”（唐·刘恂《岭表录异》）。由此可见，长途海路跋涉，并非一般商旅僧人所选择，故宁愿采取“自雷州缘岸而归”的途径。这条缘岸归径当然也必须经过合浦廉州。

钦州海路通道 钦州海路通道起点是钦州，钦州东与廉州湾对接，北与邕州、横州（今横县）相通，南与安南则海陆相连，是进入安南最便捷的通道。但当时钦州的陆地通道所过之处都是少数民族“峒民”地区，这些地区都是峒主来管理控制，多是民间交易往来，官府则选择海路通道。如此一来，“广州通夷海道”往返钦州海路，也同样要经过合浦廉州。因此，广州到安南缘岸必须途经合浦，因为中原货物大都通过南流江来到合浦港后，得装卸转口之便，未必陆路进入钦州。当时钦州有海路通安南之便，

却无内陆水路网络货运之便。这就是史籍记述中官府不选择钦州海路作为终点的原因。

廉州海路通道 在廉州逆南流江取道容州可入中原，循海路可直接进入安南。宋代以后的史书常称廉州“旧时为入安南之道”。汉马援征交趾，唐高骈海门屯兵都是经廉州海路通道出入。宋朝又在廉州西江入海口置二寨，“挖象鼻沙大水口，入海通交州海路”（宋·曾公亮《武经总要》）。在宋前后，朝廷对交趾的征伐及遣使活动都是在廉州经过。如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宋太宗征交趾，刘澄率领的军队就是从廉州而入。宋端拱元年（988年），李度作为副使出使交趾，“未到交州，卒于太平军传舍”（《宋史·李度传》）。这里的太平军就是廉州。淳化元年（990年），宋镐、王世则出使交趾，安南黎桓“遣东内都指挥使丁承正等以船九艘，卒三百人至太平军来迎”（元·马端监《文献通考》），安南的特使带领船队到廉州（太平军）迎接朝廷的使者，可见廉州海路通道在宋代的繁忙景象。正如宋代周去非所著的《岭外代答》中所记：“异时安南舟楫多至廉。”宋代廉州所产的海盐，更是“庶一水而散数州”，供应到玉林、北流、梧州等地。“自廉航海一日之程即达交趾，若由此途，则从静江而江南二千余里，可以不役一夫而办。”

（《宋会要辑稿》）乾道九年（1173年），安南中卫大夫尹子思押运官货，从临安（今浙江杭州）启程，到静江府后，地方官府就推荐他选择廉州水路通过南流江水道把货物运回安南。廉州所具有的海、水、路优势，是广州海路通道，钦州海路通道都不具备的，不但是官府指定的通道，同时也是商贾和佛教徒们首选的通路。

《壮族通史》在论述宋代的海上交通时也强调，“合浦航道：合浦古称

廉州，濒临北部湾，自古就是中国通往东南亚各国的海上通道，也是壮族和各族人民与交趾人民往来的主要航道。交趾人多从海上乘船到廉。宋以后，广州成为南方的重要对外口岸，东南诸国商旅及使者到中国，多从广州港泊岸，中国出海也多从广州港出发。合浦航通逐渐失去出海口的重要地位，但广西沿海的出口仍然合浦为通道”。

到了宋代，市舶司制度逐渐完备。其职能为：①对出口商船的管理与服务。包括发放中国商船出口许可证、检查有无夹带违禁物品、设宴饯行即将出海的中國商船、护送商船到珠江口、给前往国内其他港口的中国商船以“防船兵仗”等。②对进口商船的管理与服务。包括船只到达之前的祈风祭神，检查进口船只有无夹带违禁物品、进口货物的抽解、博买，接待外商、贡使等以及其他与外贸有关的事宜，例如向朝廷报告贡船到岸消息，向汴京、行在转运舶货，出卖舶货等，其根本目的是保证中央有效操纵市舶使以控制外贸。

宋代流动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商品有：①中国政府允许出口者：丝织品、陶瓷器、漆器、酒、糖、茶、米等；允许进口者主要有：香药、象牙、珊瑚、琉璃、珠钿、宾铁、鳖皮、玳瑁、车渠、水晶、蕃布、乌楠、苏木等。其中香药种类繁多，数量甚大，价值也高。②中国政府时许时禁的商品：金银、铜器、铜钱。中国政府不允许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流通的商品；兵器及可造兵器之物、一部分书籍。还严禁外国货币进口，以防“紊中国之法”。

元代时间虽短，但在合浦设置了提举市舶司和提举采珠市舶司，对后世海关的设置产生了重要意义。

明代海上丝绸之路功能的转化，以军备抗倭为主。

在合浦地方史志的记述中屡有防御倭寇入侵的记载，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因此也突出了海防的功能，这种海防的功能一直伸延至清代，形成了以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乾江港为重要军事基地的海防体系，乾体军港在明清之交盛极一时。

洪武年间为了防御倭寇入侵。廉州府就开始着手加强沿海防御设施的建设，除了调动军队集结在西场至山口一带沿海加强巡查之外，还将设在石康的永安千户防御所迁至山口海岸乡，并建永安城（山口永安因此而名）、在白龙建白龙城以作军事要塞。同年，朝廷颁旨，喻廉州府疏浚南流江，以利于加强勾通内陆漕运网络与海防的联系。这是廉州府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水利工程。这次疏浚南流江一带明显的有军事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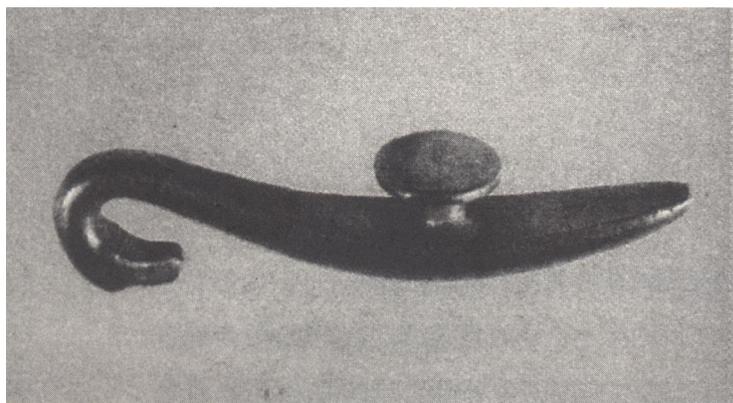


图 6-21

合浦汉墓出土鎏金带钩，是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商贸繁荣的见证。

成化年间，朝廷设置廉州守备，任命都指挥；弘治年间又任命永安守备指挥；到万历年间，再增设涠洲游击，初驻北海市境，后移到永安城，下辖各部水师有：涠洲陆营、涠洲左部、涠洲右部、乾体哨、牙山营、钦州游击哨、防城营、龙门寨、官兵员额 3684 名。加上陆军，此时廉州府的兵员已达 7649 名，各种战船 34 艘。为了加强报警设施，廉州府在沿海一

带多建烟墩，从山口到福成，自山口至冠头岭至西场共建烟墩三十多处，这些烟墩相互照望，互通消息蔚为壮观。此外，朝廷还在廉州府各海防边境地设珠场八寨和置营堡 26 个。合浦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形成了强大的海防防御体系。

合浦海上丝绸之路海防体系的建立，抵御了倭寇的入侵，也为廉州府及周边提供了安全的环境。据史料记述，明代在廉州府发生过多次倭寇入侵战事。一是永乐八年（1410 年），倭寇进攻廉州府，因城防坚固，久攻不下，至廉州府疏散了城中军民人等，才攻入空城，倭寇老羞成怒，竟然将留守在村中的教授（明代府学负责人，九品官秩）王翰杀害。二是万历四年（1576 年），倭寇进攻永安，永安指挥张本固率领水师奋起抗击，倭寇不战而退，转攻山口及闸口一带，又被各处水师会兵围攻，倭寇只好落荒而逃。广东副总兵张元勋闻讯率兵进剿，将倭寇赶至白沙香草江，此役入侵倭寇几乎全军覆没。倭寇屡经战败之后，知道采取强攻的方式是无法进入廉州城的，于是就采取了更为卑劣的行径，与海盗勾结在一起，对廉州府沿海实施偷袭侵犯。即使如此，倭寇与海盗勾结在一起，也无法突破廉州府强大的海防体系。于是，倭寇又与越南海盗串通，在沿海一带抢掠越货，屡次伺机进犯廉州城。为了彻底打击倭寇、海盗的滋扰，从嘉靖四十四年起至隆庆二年（1565—1568 年）四年间，朝廷以廉州府为军事基地，调集广东、福建的水师、派出广东总督、福建巡抚、廉州都指挥，参将等率各部实行海陆合力会剿，把倭寇海盗赶到交趾海面围歼。自此以后倭寇不敢偷窥廉州府沿海，不再轻举妄动，倭寇之乱由此基本靖清。

明代合浦海上丝绸之路海防功能的强化，表象看是由倭寇入侵而引起

的，实质上是合浦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在国际交往中的作用日益突显，这是海上丝绸之路日趋国际化的反映。此间，特别是郑和七下西洋的影响，海上丝绸之路的对外贸易商品也空前扩展，合浦拥有联通内陆漕运的优势，也有众多与江河连相通的港口，因此，在商贸、军事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这就是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在明代成为海防重地的重要原因。

明代的航海中，最伟大的壮举就是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虽然没有在合浦停歇登岸，但细究郑和七下西洋，会从中发现 600 年前郑和的航海路线及七下西洋所携带的贸易商品，基本上与两千多年前以合浦为始发港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及贸易商品相似。



图 6-22

抗倭要塞白龙城。

首先是航海路线。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止航线是：合浦—都元国（苏门答腊一带）—邑卢没国（泰国境内）—谿离国（泰国境内）—夫甘都卢国（缅甸）—皮宗（新加坡、印尼）—黄支国（印度一带）—已程不国（斯里兰卡）。郑和七下西洋的航海路线是：江苏港口—占城（越南）—爪哇（印

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一带) — 苏门答腊 (印度尼西亚) — 满加刺 (马来西亚) — 马六甲 (马来西亚—甘巴里) — 柯枝 (印度) — 忽鲁谟斯 (伊朗波斯湾口)。

郑和是循着汉代海上丝路的航线下西洋的，不同的是，郑和的航线延伸至伊朗和非洲东岸，这是因为明朝航海技术已经相当发达。

其次是外贸商品。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外贸商品有：丝绸、陶瓷、茶叶、黄金、珠玑、犀牛 (角)、玳瑁、璧琉璃、农具、象牙、玛瑙等。而郑和七下西洋期间的主要商品虽然有 191 种之多，但归纳起来，大类依次是茶叶、丝绸、金银、珍宝、瓷器、香料、建材、铁器、日用品，具体分列细项几乎与汉代海上丝路的外贸商品相同。不同的是增加了进口的布料、珍稀动物和医药类商品，但依然是以汉代海上丝路的外贸商品为“主打”。

郑和七下西洋的航海路线都是沿着以合浦为始发港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前进，船队是否有可能在合浦港停留过或作过中途访问呢？



图 6-23

合浦明代官窑上窑遗址中仍有大量的瓷器残片。

郑和七次下西洋虽然是从江苏境内不同的沿海港口出发，但第一个中转站都是占城，并在占城设立了面向东南亚开展商贸活动的大本营。为了

使这个大本营成为信息决策中心，郑和专门聘请了大批海外华商及经贸专家担任顾问，参与制订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开展海上贸易的发展计划和实施方案，建立相当于今天的总领事馆之类的常设机构。占城位于越南南部，与合浦郡或廉州府有着悠久密切的地缘关系。特别是值得一提的，在鸦片战争前的清代道光年间，越南白龙尾一带海面一直都是廉州府的防守海域（见《清实录·宣宗卷》）。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广东水师巡哨防区的中路即由虎门至白龙尾（白龙尾即今越南海防至清化一带海面），这是建立军事方面的协防。在经济上更是密切不可分，贸易往来自成一体。宋代廉州团练使陶弼曾在诗中描写“商夸合浦珠胎贱，民乐占城稻谷丰”，则是一种贸易交流行为。由此可见早在宋朝，占城与合浦在贸易上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共同体”。郑和把占城当作大本营，占城与合浦关系密切，合浦又是作为外贸商品物流的重要拳头商品之一的珍珠的丝绸、陶瓷的主要产地，郑和派员进入合浦采购珍珠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因为，郑和既然可以跑到15000海里外的伊朗采购珍珠，也可以到与占城这个大本营的邻的合浦采购举世闻名的珍珠。何况明代又是朝廷在合浦大肆采珠的时期，仅弘治十二年一年合浦的采珠量就达二万八千两（旧制），郑和七下西洋的船队到过或途径合浦，探访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珍珠故地，是符合航行路线和贸易旋律的。

根据《万历明会典》记录，明代进口商品主要有：①香料类，如胡椒、薰衣香和龙脑等。②珍禽异兽类，鹦鹉、孔雀、黑熊、红猴等等。③奇珍类，珊瑚、玳瑁、象牙、玛瑙等。④药材类。⑤军事用品类。⑥手工业原料主要有锡、红铜、石青、硫黄、琬石、牛皮、磨刀石、番红土、西洋铁、

回回青。出口商品主要是瓷器、铁器、棉布、铜钱、麝香、书籍等，其中尤以生丝、丝绸和棉布为最大量。

根据屈大均调查统计，以合浦为始发港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到明末清初之后，商品流通的国家和商品流通的种类得到了大规模扩展，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开展商品流通的国家和商品交易的种类，记于《广东新语》：

诸番之直广东者，曰婆利，曰古麻刺，曰占城，曰真腊，曰爪哇，曰暹罗，曰满刺加，曰大泥，曰蒲甘，曰投和，曰加罗希，曰层檀，曰赤土。其直安南者，曰林邑，曰架架，曰三佛齐，曰急兰丹，曰顿逊，曰州湄，曰悖泥，曰阁婆，曰扶南，曰彭亨，曰毗薹，曰天方，曰锡兰山，曰西洋古里，曰榜葛刺，曰苏门答刺，曰古里班卒。是皆南海中大小岛夷，见于明祖训、会典者也。其不可考者，有犍、罗兰、顿田、离其、门毒、右笪、罗越、佛逝、诃陵、个罗、罗谷罗、婆露、狮子、摩逸、佛朗机诸国，则未尝人贡懋迁有无者也。安南本汉交趾地，洪武初朝贡，其物有金银器皿、熏衣香、降真香、沉香、速香、木香、黑线香、白绢、犀角、象牙、纸扇。占城本古越裳氏界，洪武二年，其主阿答阿首遣其臣虎都蛮来朝贡，其物有象、犀、象牙、犀角、孔雀、孔雀尾、龙脑、橘皮、抹身香、熏衣香、金银香、奇南香、土降香、檀香、柏香、烧碎香、花藤香、乌木、苏木、花梨木、鞠蔓、番纱、经印花布、油红绵布、白绵布、乌绵布、圆璧花布、花红边纒、杂色纒、番花手巾帕、兜罗绵被、洗白布泥。暹罗在占城南，洪武四年，其王参列昭毗牙遣使柰思俚侪刺识悉替等来朝贡，进金叶表，其物有象、象牙、犀角，孔雀尾、翠毛、六足龟、龟筒、宝石、珊瑚、金戒指、铜鼓、片脑、米脑、脑、脑油脑、紫檀香、速香、安息香、黄熟香、

降真香、罗斛香、乳香、树香、木香、乌香、丁香、丁皮、阿魏、蔷薇水、琬石、紫梗、藤竭、藤黄、硫黄、没药、乌爹泥、肉豆蔻、胡椒、荜拔、苏木、乌木、大枫子、苾布、油红布、白缠头布、红撒哈刺布、红地绞节智布、剪绒丝杂色红花被面、织杂丝竹布、红花丝手巾、织人象杂色红文丝幔。真腊本扶南属国，洪武六年，其王忽儿那遣使柰亦吉郎等来贡，其物有象、象牙、犀角、孔雀翎、苏木、胡椒、黄蜡、乌木、黄花木、土降香、宝石。爪哇本古闍婆国，洪武三年，其三昔里八达刺遣使八的占必等来朝贡。其物有胡椒、荜茇、黄蜡、乌爹泥、金钢子、苏木、乌木、番红木、蔷薇露、奇南香、檀香、麻藤香、速香、降香、木香、乳香、黄熟香、安息香、乌香、荜拔、茄龙脑、血竭、肉豆蔻、藤竭、阿魏、庐荟、没药、大枫子、丁皮、番木鼈子、闷虫药、碗石、宝石、珍珠、锡、西洋铁、铁枪、摺铁门、铜鼓、苾布、油红布、孔雀、火鸡、鹦鹉、黑熊、黑猿、白鹿、销袱、金母鹤顶金厢戒指、撒哈刺白苾布、姜黄布、撒都细布、西洋布、花幔、片脑、梔子花、蔷薇露、沉香、乳香、黄速香、金银香、降真香、紫檀香、丁香、丁皮、乳香、胡椒、血竭、乌爹泥、肉豆蔻、没石子、阿魏、窠铅、片脑、肉果、玛瑙珠、竹布、苏合油、乌木、苏木、大枫子、番锡、番盐。三佛齐本南蛮别种，在占城南，洪武四年，其王哈刺扎八刺卜遣使玉的力马罕亦里麻思奉金字表来朝贡。其物有黑熊、白獭、火鸡、孔雀、五色鹦、诸香、兜罗绵被、苾布、龟筒、胡椒、肉豆蔻、番油子、米脑。洪武四年，其王马谟沙遣使亦思麻逸朝贡，速香、檀香、丁香、肉豆蔻、黄蜡、瑇瑁、龟筒、羸壳、鹤、熊皮、犀角、孔雀、倒挂鸟、五色鹦、黑小厮。锡兰山，正统十年，其王遣使耶把刺谟的黑哑等来朝贡。其

物有宝石、珊瑚、水晶、金戒指、撒哈刺象、乳香、木香、树香、土檀香、没药、西洋细布、藤竭、芦荟、硫黄、乌木、胡椒、碗石。苏门荖刺，永乐三年，其王销丹罕难阿必镇遣使阿里来朝贡。其物有马、犀、牛、龙涎、撒哈刺眼木香、丁香、降真香、沉速香、胡椒、苏木、锡、水晶、玛瑙、宝石、石青、回回青、硫磺、番刀弓。大坭，称隶暹罗助贡国，其来贸易，有胡椒、乳香、血竭、没药、片脑、荖拔、乌爹泥、土檀、黄檀香、降香、沉香、沉粟香、丁香皮、乌木、苏木、藤黄木、贪子、龟筒、象牙、番牛角、瑇瑁、珠壳、宝石、打麻、西洋布、竹布、菱张席、灰筒。急兰丹，正德四年来贸易，有胡椒、乌木、丁皮。以上凡十二国，皆尝来往广东者。旧例，贡舶三艘至粤，使者捧金叶表，入京朝贡，其舶市物还国。次年三舶复至迎敕，又市物还国。三年三贡，或五年一贡。一贡则其舶来往三度，皆以澳门为津市。黄文裕云：往者番舶通时，公私饶给，其贸易旧例，有司择其良者，如价给之，次则资民买卖。故小民持一二钱之货，即得握椒。展转交易，可以自肥。广东旧称富庶，良以此。助国供军既有赖，而在官在民又无不给，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者也。议者或病外番闯境之教育界虞，夫暹罗、真腊、爪哇、三佛齐等国，洪武初首贡方物，臣服至今。永乐时，渤泥入朝，没齿感德。成化间，占城被篡，继绝蒙恩。南方蛮夷，大抵宽柔，乃其常性，百余年间，未有敢为寇盗者。



图 6-24
合浦汉墓出土文物发掘现场。

在明代海上丝绸之路诸多航线的基础上，清代开辟了北美洲海路航线、俄罗斯海路航线和大洋洲海路航线等；同时，外贸的港口有所增加，地域有所扩展，来往商船频繁，商品量值上扬。出口商品中茶叶占主导地位，丝绸退居次席，土布和瓷器（特别是广彩）也受到青睐。进口商品中，就吨位言，棉花居首，其次是棉布和棉纱，毛纺织品退居第三；就价值言，鸦片逐渐占据了首位，并从原来的地下贸易变成合法化。

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清政府在粤（其中在廉州设有海关和十多个海关分卡、子卡）、闽、浙、苏四省设立海关，这是中国近代海关制度的开始。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许多国家逐渐在中国设立商馆。清代海外移民形成高潮。华侨还纷纷建设会馆，相当程度影响当地经济的发展。

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对国内外市场网络的扩大、农业商品化的推进、民族工业的兴起、城镇经济的发展、交通运输业的繁荣以及中西文化的交

流都起到了拉动作用。

到了清代，合浦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异彩纷呈的新格局。



图 6-25

廉州古城老街，当年是专营爆竹烟花专业街。